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一三五辑一

总主编：李玉明

渠家大院主人渠仁甫

渠荣臻 魏思思 著

晋商是我国明清以来的一支重要商帮，他们创造了许多商业史上的奇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著名晋商家族祁县渠家在晋商后期具有重要的代表地位，其经营的票号、茶庄、布庄遍布海内，盛极一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渠家大院主人渠仁甫 / 渠荣录, 魏思思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11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 李玉明总主编. 第35辑)

ISBN 978-7-5457-0311-5

I. ①渠… II. ①渠… ②魏… III. ①渠仁甫 (1880~1963) — 传记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755号

渠家大院主人渠仁甫

著 者: 渠荣录 魏思思

责任编辑: 吕文玲

助理编辑: 薛勇强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天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32.5

总 字 数: 640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10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311-5

总 定 价: 80.00元 (全套2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引子.....	1
一、儒门世家.....	2
二、兴学育人.....	7
三、诚信经商.....	12
四、乱世流离.....	17
五、夕照青山.....	21
六、诗文书藏.....	24
七、结束语.....	40

引子

晋商是我国明清以来的一支重要商帮，他们创造了许多商业史上的奇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著名晋商家族祁县渠家在晋商后期具有重要的代表地位，其经营的票号、茶庄、布庄遍布海内，盛极一时。

作为渠氏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渠仁甫先生秉承晋商诚信仁义的精神，经营渠氏商业40年，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见证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富强的历程，参与了兴国育人的伟大事业。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人谦恭，处事公正。他经营商业坚守晋商传统理念，坚持以诚信为本，从不投机取巧，对坑蒙拐骗的勾当更是深恶痛绝，因而，渠氏商业成为晋商后期的一面旗帜。他热心教育，以兴学育人、教育救国为己任。1919年，他独资创办了祁县竞新学校，办学十八年，共计投资银元8万元，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赞誉。他深明大义，坚持民族气节，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宁愿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也不当亡国奴。他热心公益，为社会、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因而，几十年来一直为祁县人民所敬仰、传颂。

渠仁甫先生身上体现出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儒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一位末代老晋商的人生经历，究竟充满着哪些跌宕起伏的精彩片段呢？就让我们沿着渠仁甫的生活道路来寻求答案吧。

一、儒门世家

渠仁甫，名晋山，字仁甫，后以字行。又字忍夫、纫芙，号稚衡，别号逋翁，藏书室名四不若斋、暗修书室。1880年3月8日，渠仁甫出生在祁县城内东大街渠家大院，是闻名全国的晋商世家祁县渠家第十九代传人，是著名晋商渠源潮之长孙，山西祁县“渠家大院”的主人，是晋商后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渠仁甫的祖父渠源潮（1840-1917），字星海，幼年读书，但未考取功名，“以屡次乐输，由太学生以分部员外郎选用”（《渠星海墓表》）。事父母以孝闻。虽然出身富商家庭，但不喜奢华，持家严谨，自奉俭约。生性宽厚，乐于助人，亲朋邻里受其周济者甚多，是晋商中著名的忠厚长者，社会声誉极高。商界都以与他交往为荣，1877年，山西大旱，渠源潮捐巨款赈贫济困。山西巡抚曾国荃手书“载籍之光”匾额授之，以示褒彰。此匾现仍在祁县渠家大院中。1905年，祁县中学堂成立，渠源潮又赞助白银一千两，校方曾为之树碑表彰。

渠源潮娶妻李氏，生有本漳、本渊两个儿子。本漳即渠仁甫之父。本漳（1861-1890），字衡斋，同知衔，平定州儒学训导、附贡生。娶妻段氏，仁甫为其独生子。渠源潮对这位长门长孙，自然视作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不料父亲本漳29岁早逝，渠仁甫从11岁时便由祖父教养。他的叔父本渊（1873-1903）也于31岁早逝。渠源潮老年丧子，更把疼惜之情转移到孙辈身上，体贴入微，呵护备至。渠仁甫的母亲段氏，是一位懂事理的贤妻良母，丈夫去世后，为了培养儿子长大成人，对他要求严格，诸如“席不正，不坐”，“食不言，寝不语”，等等。他对母亲非常孝顺，长大成人后，每天晚上必到母亲房间请安问候，这一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直到母亲去世。祖父的宽厚仁爱、孝敬父母、中庸仗义、乐于助人，母亲的严格、慈祥，都对渠仁甫的一生影响极大。

除祖父渠源潮、母亲段氏外，对青少年时期的渠仁甫影响较大的还有其二祖父渠源洙、堂叔父渠本翘及岳父刘奋熙。

渠源洙（1842-1920），字筱洲，号龙川，因乳名叫旺儿，因而乡人称“旺财主”。他是渠源潮之胞弟，但比他哥哥更有商业才干，“时诸典肆者欺公年幼，渐骄纵，且有以利诱者。公嚼然不惑，连罢20余肆，众悉耸然。而公家业于以日隆”（《渠源洙墓志铭》）。光绪初年，捐资为刑部员外郎。在职期间，对各国法律颇有研究。1880年，中俄发生外交争端，清廷派曾国荃驻防乐亭，以防东北之变。源洙应邀作为幕宾随军，帮助筹办粮饷，事平后返京。不久请长假返回祁县，从此不再出仕，专营商业。其经商理财之道一向以谨慎稳妥著称，从

不贪做投机生意，最忌冒险与迟滞。因而被商界公认为是旧式商业的典型，最具有保守的特征。经商一生，几乎没有发生赔累亏损的事例。

渠本翘（1862-1919），原名本桥，字楚南，号湘笙，渠源浈之长子。1885年，“以第一人入泮”，考取秀才。学政吕瑞田对他十分器重，改其名为本翘。1888年中解元，1892年中进士，为三甲第四名，以内阁中书用，时年30岁。1902年，山西省商务局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经营不佳，赔累严重。渠本翘以5000两白银把这个公司盘过来，又联合祁县南社村人乔雨亭，两人合资18000两，改组为双福火柴公司（即平遥火柴厂的前身）。这是山西省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渠本翘成为山西省最早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从此引发了山西民营资本办工业的热潮，带动了山西现代工业的发展。1903年，受任为外务部司员驻日本横滨领事。次年返国，调任山西大学堂监督。1905年，本翘与祁县士绅商定，就昭馀书院旧址改办祁县中学堂。1906年，在爱国保晋护矿运动中，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为从英国人手中赎回山西煤铁采矿权做出了特殊贡献，清政府命以三品京堂候补。1910年，清政府实行立宪活动，成立典礼院，本翘被授为典礼院学士。从此，人称“渠学士”，成为山西政界、商界名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起而响应。清政府任命本翘为山西宣慰使，旋又改命为南北议和随员。和议告成，帝制消亡，本翘即寓居天津，以清朝遗民自居，不再出仕。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也曾极力拉拢他，委以参政之职，本翘一直坚辞不受。此后，致力于收藏、著述和整理出版。1919年5月猝然去世，终年58岁。

渠源浈、渠本翘父子的开拓、闯荡精神，以及有远见、有魄力、爱国家、不做投机生意的行为，给渠仁甫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刘奋熙（1857-1899），字振翼，号筱岩，祁县塔寺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山西科试中举人，受到当时文坛著名人士、山西学政王仁堪的称道，并拜为师。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他和渠本翘在清代“重商轻学”的祁县，是少有的两名进士。他性格豪放，思维活跃，任贵州罗城县、天柱县知县6年，政绩显著，清廉刚介。辞官回乡后在贾令镇设帐讲学授徒，著《爱薇堂遗集》4卷。他还行医济世，是晋中乃至全省著名的大儒名医。刘奋熙廉洁奉公，为政清廉，学识渊博，医术高超，成为渠仁甫崇拜的偶像。

渠仁甫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既商又儒的家庭，7岁开始在自家私塾读书，塾师李叔瑜等都是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所以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严格的教育。加之渠仁甫天资聪颖，熟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在传统思想的熏陶下，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他固有的观念。加之家境富裕，有经济能力，于是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志振

策九衢驰，奋翼翱翔九霄上”是他的誓言，“读书冥观求阃奥，下笔顾盼争雄雌”是他的雄心，他立志要做一番事业，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

1903年，渠仁甫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录为县学生员，次年岁考又列第一，补为廪生。山西大学堂成立后，他很想去洋学堂就读深造，但因其祖父渠源潮要培养他经商，继承庞大的家业，未能如愿，失去了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对此，他终身引以为憾。

渠仁甫一生秉性刚直，不随波逐流，“仁义礼智信忠孝”、“三纲五常”是他做人的原则，他一生最厌恶之事，是官僚的贪污腐败和商人的投机倒把和唯利是图，甚至发国难财。在旧中国他从来不与官府来往，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过问地方的政事。唯一的一次挺身而出，是为民请命。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倒蒋，阎锡山为筹措大量的军费，加紧征收田赋，使人民遭受巨大灾难。军队经过祁县时，车马支差均由祁县百姓负担，再加上经办者从中贪污，激怒祁县人民。1931年，祁县各界吁请渠仁甫出面，召开全县各界代表大会，他慨然允应，在祁县教育会召开了两天大会，到会者近千人，会上他向县长提出质疑，并提出惩办贪官的要求。最终以拘留经办人不了了之，当时也只能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的商号有的经营尚可，但他深恶痛绝当时一些山西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决意把大多数商号结业。事后，山西同乡们赞其有先见之明。

他素重民族气节，誓不做亡国奴，一生最痛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八十自悼》诗中称其为“封豕与长蛇”，即大猪与毒蛇，古人曾以此称侵略者。“七七事变”后，日寇逼得他背井离乡，逃难成都，三位亲人逝于他乡，尸骨未还；日寇占领祁县，扼杀了他一生笃爱的教育事业；侵华战争使他的商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因此，他积极参与和支持抗击侵略者的行动。早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祁县《明报》组织各界成立抗日救国会，支援东北马占山将军和十九路军等抗日部队，他均带头慷慨解囊。1937年，日寇占领祁县后，祁县“长裕川”通过李琢如（后被日军杀害）多次向八路军捐款、捐物，支持抗日。

他为人正派，严以律己。教子孙念书，“吾日三省吾身”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必授的一课。他以身作则，并教导家人，不许酗酒，不许赌博，不许嫖娼，更不许纳妾和抽大烟。他一生虽拥有大量资本，但生活却极俭朴，他教子孙读的第一首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从来是棉布衣服，不穿绸缎、皮袄，家里的膳食极其简单，远不如商号的伙食，他每日三餐，除午饭一荤一素外，早晚多是韭花、酱豆腐、小菜等。除请客应酬和过年过节外，鸡鸭海味更是难以见到。就连抽烟也是如此，一支纸烟要剪成四五小段，每次用烟袋锅抽上一小段，一天就抽两三支烟。但对帮困济贫、扶助他人

的社会善事，却是慷慨解囊，倾情相助。对亲友、商号同仁有困难者，只要不是好吃懒做和抽大烟的，相求者都会得到一定资助。

他开明进步。虽生长在封建时代和封建家庭，但由于受维新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并不守旧，接受新事物快。其长女出生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女子没有不缠脚的，而他却不让为其缠脚。他从不迷信神鬼，民国十八年（1929），将家中的神像（除祖宗牌位）全部拆除。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实行火葬的倡议，并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名，他听说此事后，认为毛主席很开明，倡议很好，他要学习。他去世于1963年，当时民间还均为土葬，且太原火葬设施十分简陋，在山上土窑洞内点燃木材直接焚烧遗体，即使这样他也决定带头实行火葬。他所创办的竞新小学，是参照西方的教学方法，并设有英语课，有化学实验，有“学生自治会”，等等，迥然不同于他自己所读的私塾。他临死时告诉儿子，他死后要放弃全部定息。

渠仁甫对其子孙的教育也异常严格。他们从小都没上过初小，有的直接上高小一年级，有的直接上高小二年级，有的甚至直接上初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全由渠仁甫在家中亲自教授。他既是父亲、祖父，又是子孙的启蒙老师。从1918年教长子念书开始，断断续续延续到1947年两个孙子上高小为止，整整30年。每天坚持，一日不误。当他的两个孙子开始读书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举家迁往成都，他以竞新小学的水平，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学校相比，认为成都的小学校是“误人子弟”，所以不让他们上当地小学，由他在家亲自教。课程最初是认字、写字，然后是语文、作文、历史、算术、书法、珠算。语文课本是《三字经》、《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历史课本是《史鉴辑要》，算术没有课本，他用石板、石笔一道题一道题的教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小数、分数，等等，孙子们也在石板上一道一道做练习题，做完一道题后，即用绒布条缝制的圆形擦子擦了再做下一道题。他小时候没有学过阿拉伯数字的数学运算公式，为了教子孙念书，他竟全都学会了。他算盘打得很好，教珠算时要求子孙必须学会多位数的乘除法。他讲课深入浅出，把竞新小学“讲读以训练口眼，问答以训练口耳，书写以训练手眼，笔算以训练手脑”的教学方法用在对于子孙的教育上。做算术题既要眼看思考，又要动手写算式，同时嘴里还要一边默念，所以很少发生计算错误。思想品德教育则贯穿在语文教学中，在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等课程时，把“克己复礼”、“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思想很自然地灌输给了子孙。由于教得严格认真，给子孙们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文化基础，他们到学校后，在班里都是优秀学

生。儿子渠川祐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女儿渠川馥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长孙渠荣天津大学纺织系毕业，次孙渠荣钱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复旦大学放射化学专业研究生。他们在工作中都兢兢业业，在做人上都踏踏实实、诚诚恳恳。总之，渠仁甫对子孙的教育给他们一生的思想、品德、学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们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

二、兴学育人

渠仁甫青年时，正值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存亡迫在眉睫。同时，也是变法维新思潮迅速传播之际，康、梁维新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认识到，列强之所以强，关键是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要“光明疆盛”，就必须培植青少年，于是产生了教育救国、兴学育人的念头，以此“为社会稍尽绵力焉耳”。他的堂叔父渠本翘创办祁县中学的成功范例也为他树立了榜样。1919年初，就在他执掌家业的第二年，独资创办了祁县私立竞新学校，开始实践他平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和抱负。

1919年3月，渠仁甫邀请清末举人、前祁县中学校长张学钦（字敬甫）先生和清末秀才、书法家杨芳（字琅圃）先生磋商办学事宜，两位先生愿全力以赴、鼎力相助。渠仁甫先租赁城内小东街大槐树底路北园大门院（现小东街30号院）为校址，又借占城内新道街路北空场地为操场。礼聘张学钦为教务管理员兼教员、杨芳为杂务事务员兼教员，先期筹办一切。

当时政府规定，中小学校长必须由洋学堂毕业生担任。为此，渠仁甫奔赴太原，找其好友温国璋先生（字奉峨，曾任祁县中学校长），说明来意。温同渠又找到太原阳兴中学校长韩业芳，韩则极力推荐应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韩耀明。于是，渠仁甫礼聘韩耀明为竞新学校校长，负责校中全权事宜。1919年招收高级、初级两班学生共30余名，暑期正式开学授课。

1920年2月，本县及周边各县学生踊跃报名投考，学校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势。全校共招收学生104人，编为一个高级班、一个高级补习班、一个初级复式班，学校初具规模，正式向县府、省府报告备案。同年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题赠渠仁甫“急公好义”横匾一块。

随着学校的发展，旧校址已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渠仁甫又购置了小东街路南的东西楼院和四座小院，合并一处，改建为新校址（现小东街62号院）。全校共有礼堂一座、教室5间、校务会议室3间、寝室兼自习室34间、教员室8间、事务室2间、传达室1间、应接室2间、成绩室1间、书报阅览室3间、储藏室3间、工友室3间。饭厅及厨房另占一小院。同年秋，东西楼院改建竣工，高级、补习两班学生转入新址，初级班仍在旧址寄宿授课。期间，渠仁甫投资银元13863元。1921年3月新校址改建完毕，初级班学生也全部转入新址。同年，又购置了城内新道街路北空地及破院数处，拆除后铲修平坦，命名为“竞新大操场”。操场南北长29丈、东西宽15丈，面积为435平方丈，内设足球、篮球、网球等场馆设施。

仅竞新操场一项，开支银元 5645 元。

1926 年，渠仁甫又在羊树坡街购置房产，成立了竞新图书馆，除供师生阅读外，还免费向社会开放。因为藏书丰富，前来阅读的人络绎不绝，是当时山西省影响极大的公益性图书馆之一，备受社会各界称赞。

1929 年，学校举行了“十周年校庆”活动。省教育厅、县教育局都派人参加指导，校董的商号“长裕川”、“永春原”、“书业城”的掌柜也到校庆贺。当时还出版了《祁县私立竞新学校十周年概况》（简称《概况》）一书。县长师润庠、校董渠仁甫、校长韩耀明都作了序。《概况》还收集了校董相片、校长相片、教师相片、历年来毕业生相片、学校校训、学校的教学方法、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在校师生名录、毕业学生名录等，《概况》对竞新学校办学 10 年的历史做了全面详尽的总结，在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同时，渠仁甫有了建竞新中学的想法。于是兴建小操场，购置图书、仪器、中西乐器、教学用具等。1932 年后，教师队伍又有所壮大，太原国民师范校长冯直多次向竞新学校推荐其优等生来校任教。教师队伍年轻化、知识化，是这个时期竞新学校的特点，也是学校发展的黄金时代。

竞新学校办学 18 年，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李岗、张尚义、翟汝玉、杨汝义、孔繁桐、武克鲁、贾步云、戴斌等。建国后，党政、军事、科技、金融、教育、文艺，以及医疗卫生各部门均有竞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如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贾步彬、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武汝扬、原炮兵学院顾问王崇德、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委员、研究员范大煊、原山西矿山机器厂高级工程师韩瑞恩、原天津市建筑物资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李达民，等等，还有在大洋彼岸的阎兆熊、马列克仁、何骞等。他们都是竞新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50 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的竞新学校毕业生贾步彬曾深情地回忆道：“祁县私立竞新两级小学校，是由本县开明士绅渠仁甫先生创建的。仁甫先生是一位有识之士，为了有益于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举办了这件好事，这是值得纪念和称颂的。”

渠仁甫办竞新学校是出于对文化的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一般私立学校不同的是，他办学的目的不是为盈利。从 1919 年到 1937 年，办学 18 年中，共投入银元 8 万元，毕业生约 1000 余人，平均为每个学生投入银元 80 元。竞新学校开办到第 5 年，渠仁甫感到教育面还不广，许多家境不好的儿童还不能入学，于是从 1924 年开始，“鉴于社会生活艰难，为普及教育，体恤寒素起见”，他决定“高等班学生每学期所纳之学费六元，国民班学生所

纳之学费三元，一律免收”。此后 10 余年，竞新的学生明显增多。他对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更是鼎力相助，不仅资助他们上小学，小学毕业后仍继续资助，直到大学毕业的就有五六人。

当时祁县乃至山西全省的小学教育相当落后，虽然学校的名称已由学堂改为学校，但只是徒有虚名，教师大部分由原来的私塾先生充任，他们只知旧书，不懂新学，甚至不会用阿拉伯数字做演算题。渠仁甫决定用新的理念来创办学校，即聘请新式教员，使用新式课程，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学生。竞新小学的校训“崇俭、耐劳、进取、爱群”就明确显示了他的办学方针。

该校的教学方法十分先进科学，以人为本，十分人性化。在《概况》的《教学方法之主张》中有详细的阐述，突出的是启发式教育，贯彻两“注重”：一是注重“自动”，“调动儿童之兴趣与勇气”，“讲授课时务使儿童成为表演者”，“未授前先令儿童自己学习、准备，其未能领会者，教师从旁指导，相机辅助”，“主张儿童自动、自学，先令儿童互相研究，然后再详细补充讲解”。还主张“复式教授”，即“使优良儿童从旁辅导低能儿童”，使双方都能提高和有所收益。主张因人施教的“个别教授”，“对于低能儿童，俾其反复练习，务期其了解；对于优良儿童，特于课外酌量加授适合社会需要之学科，并指明参考书籍，以尽其材力，而期其深造”。二是“注重训练”，不主张死读书。“本校之训练，特注意发展儿童精力，即教授时：或讲读以训练口眼，或问答以练习口耳，或抄写以练习手眼，或算写以练习手脑，均注意练习其五官百体，使灵活敏捷，以增长处理事务之能力”。学校经常组织开展讲演会、辩论会、书报阅览交流会、成绩展览、书法展览、美术展览等活动，还组织有篮球队、乒乓球队、歌咏队、乐队，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与私塾截然不同的是，该校采取学校教育与实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如讲棉花，除在教室看挂图外，还要到村里请农民讲，到地里看；讲空气时，学生亲自制氧、制氢。学校设劳作课，学生自己动手制作蜡烛、肥皂、雪花膏、抄本、粉笔等等，然后拿到“竞新消费社”出售，只收工本费。小学搞勤工俭学活动，当时在全省可谓首创。

该校很注重培养、陶冶儿童之优良习惯，注重“德（训）育教育”，“发展合作互助之美德”，“养成守规律之习惯”，“养成俭朴之风尚”，“养成学生劳动之习惯”，以培养学生团结互助、守纪律、尚俭朴、爱劳动之品德。竞新小学还有一整套严格的校规。学生上课，课堂有守则；学生玩耍，操场有守则；学生吃饭，饭厅有守则；学生睡觉，宿舍有守则；学生看课外书报，阅览室有守则；学生离校，有请假制度，等等。更可贵的是，学校还制订了执行制度的保证措施，监督执行机构是“学生自治会”（1934年后，参考社会编制，学生自治会

改称为“竞新市市政府”)，学生干部考察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周小结一次(包括学习成绩)，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这样做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又培养了学生遵纪守法的习惯。

在封建思想统治数千年的中国，在国民教育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竞新学校能制定并实施如此先进的教育模式，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教学思想和方法一点也不过时，而且有许多还恰中当前教育之时弊。

竞新学校之所以不折不扣地贯彻上述教学方法，缘于有以校长韩耀明为首的一批骨干教师，如郭维芝、刘龙田、陈孚之、石克明、米长元、史孔昕等，他们都是德高望重、成绩斐然的优秀教师。他们尽职尽责，除讲授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外，还要讲授补充教材，如国语课的补充教材，就有《古文必读》、《古文词类纂》、《古文笔法百篇》等。一学期补讲 20 篇，到高级班毕业时，共补讲近 200 篇。数学兴趣活动小组每班都有，如高 12 班的阎传播、乔廷相、朱相国等人，在韩耀明校长的辅导下，编印了《算术汇编》一书，并由祁县《明报社》出版。

从 1933 年竞新学校高 10 班起，全县高级班毕业生开始举行会考。会考后，其成绩均在县衙门前掩壁上发榜公布。每年会考，榜上前几名都是竞新学校的学生。尤其是 1936 年的会考，全县前 10 名学生中前 9 名学生都是竞新学校的，参加会考的高 13 班学生，其成绩都在甲等行列里。该校以师资好、校风良、校规严、设备全、成绩优闻名于三晋大地，多次受到县、省级政府的嘉奖，并两次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嘉奖。现在尚可看到 1922 年大总统黎元洪亲笔题写的“敬教劝学”横幅奖状。

“七七事变”前夕，全民抗日情绪高涨，高 15 班班主任史孔昕老师在韩耀明校长的支持下，请来了牺盟会员为学生讲游击战术；学校歌咏队队长张尚礼，徒步去五里疙瘩军事教导团学唱抗日歌曲，返校后再组织学生演练学习；全体师生有时去火神庙开会，聆听牺盟会特派员的抗日讲演。中秋佳节，师生为军事教导团将士募捐月饼，派学生代表送到部队驻地；韩耀明校长、郭少仙老师，还编了抗日小话剧、活报剧，组织学生在街头义演，使整个竞新学校、整个县城，充满了抗日的气氛。1937 年旧历十月初六，日军轰炸县城，竞新学校被迫停办。广大师生以不同形式，投入到抗日的洪流里去了。

50 余年后，竞新高 14 班毕业生、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委员、研究员范大煊回忆道：“就在这儿我开始受到了‘人格是第一生命’的教育，即做人的教育。先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老师耳提面命反复讲的。爱护自己的人格，比什么都重要，这使我

终生受益。语文、历史、地理课程，把爱国主义思想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底。一位新到校的史老师，年轻、开朗而又洒脱，是他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理想播在我们心田。”

创办竞新学校的 18 年，是渠仁甫大展雄图，实现理想和抱负的 18 年，是他一生中心情最好的黄金时期。然而，正当渠仁甫踌躇满志，准备开拓进取，创设竞新中学，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之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祁县，彻底摧毁了他的理想和事业，他仇恨满怀，痛心不已。

三、诚信经商

1917年阴历五月，渠仁甫的祖父渠源潮去世，庞大的家族产业落在了37岁的渠仁甫身上。尽管他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学问，志向是从事教育，但家族的历史责任，使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勉为其难，担当了起来。这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知道这是历史的使命，责任重大，还是以他的人品、学识和能力，全力以赴地去经营，把渠氏商业继续推向了辉煌，成为渠氏商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他的所作所为使晋商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位明理诚信的儒商。

从1917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私人工商业改造，他整整经营商业40年。在40年的商业生涯中，前后经营有8大商号。其中3个是继承祖父的家业，5个是他亲手创建的。

继承祖父遗留下的商号有3家，分别是：百川通票号、长裕川茶庄、永春原药店。

百川通票号是渠氏家族投资最早的票号，由渠源湏、渠源潮、渠源洛、渠本立合资创办。总号设在平遥南大街134号，开办于咸丰十年（1860），至民国七年（1918）歇业，时间长达59年。开业时的资本已无资料可查，歇业时资本为30万两白银，在太原、太谷、祁县、北平、天津、上海、武昌、汉口、沙市、湘潭、常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梧州、广州、潮州、汕头、西安、三原等地均设有分号。百川通主要经营汇兑、存放款业务。其中承揽官家业务较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广东巡抚曾将还俄本息4.2万两白银发交百川通汇解海关投纳。光绪二十六年（1900），湖南巡抚曾将京饷13.7万余两白银转交百川通等九家票号解京。百川通还是最早与外商发生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也是最早使用电汇的票号之一。据估算，百川通在开业的59年中约分红600余万两白银。

长裕川茶庄前后经营近200年，是晋商中开设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茶庄之一，它一直是渠家的老字号。其前身叫长顺川，开办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光绪年间更名为长裕川，民国时由渠仁甫接管。总号在祁县城内段家巷，汉口、老河口、武穴、上海、青岛、长沙、衡阳、南昌、扬州、十二圩、张家口、绥远、呼和浩特、天津、塘沽、成都、内江、乐山等地设有分号10余处。共有店员100余人，仅总号就有20余人。由于茶叶质量上乘，信誉卓著，俄国商人和蒙古牧民对印有长裕川“川”字牌商标的茶叶争相购买。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茶业生意极盛。一般每箱茶至少可获利二两白银，最高时竟达7两之多，利润极高。民国20年（1931）以后，茶业生意衰落，长裕川则改业专营食盐，并在汉口兼营仓储业务。曾耗资40万元在码头购置仓库一座，用于储存食盐和仓储业务。主要业务是贩运食盐，由江

苏淮北盐场装船起运，浩浩荡荡的船队沿长江运往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规模之大，称冠一时。抗日战争期间，还曾在成都经营棉纱、棉布。建国前夕，各地分号全部撤销，仅留汉口一处。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约合人民币 5 亿元（旧币）。1953 年迁回祁县，改成建新砖瓦厂。1956 年按当时的政策公私合营，改为太原瓷厂，折合股金 14600 元。

永春原药店是渠家的老字号，开设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北大街。它是一家前店后厂式的中药材加工企业，业务范围广泛，批零兼营，以药材地道、疗效显著闻名三晋大地。长年高薪聘请名中医坐堂问诊，柜台服务周到，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一应俱全。该店自制防治感冒的“防疫宝丹”和治肠胃的“平痧丸”是当时家庭的必备良药。从祁县现存资料得知，永春原也生产龟龄集。它卖的每一味药都要用专用纸包好，纸上印有药名、功能及用法，深为客人称道。它在北平、天津、济南、祁州、禹州、安国、包头、西安、成都、汉口、广州、香港、昆明等地都设有分号，从事采购、批发业务。民国时期由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共同经营，后归渠晋云独资经营。但渠晋云早逝，仍由渠仁甫代理经营，资本 3 万元，由于经营有方，仅流动资金达 30 万元之多，资本增值 10 倍。建国后，永春原改组为宏达堂药店，公私合营后并入县药材公司。

他亲自创办的商号有 5 家，分别是：晋裕诚布庄、集庆和夏布庄、诚记茶号、书业诚古籍字画店和是盛楼点心店。

晋裕诚布庄为渠仁甫独资经营，是民国初年接管歇业的祁县裕丰久金银首饰店，改营布匹。总号设在榆次，上海、西安、郑州、成都等地均有分号，以批发为主，抗日战争胜利前结业。

集庆和夏布庄是民国初年长裕川接收太谷恒裕涌成立的，经营夏布业。在北平设总号，四川荣昌县设分庄，将四川的夏布销往东三省，远至朝鲜、俄国。该夏布庄是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合资的。渠晋云逝世后，由渠仁甫全权经营，抗日战争前东北沦陷，交通阻滞，销售不畅，因而结业。后由原夏布庄的同仁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前结束。

诚记茶号为渠仁甫独资经营。抗日战争期间成立。专营“三和茶”（又称“千两茶”，圆柱形，重 1000 两），总号在湖南安化，并设有茶厂，由安化收购、生产茶叶，运至西安销售。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人民币 3 亿余元（旧币）。1956 年湖南安化、西安两地商号，按当时政策，分别进行公私合营，改为安化资江铁厂和太原车具修造厂，折合股金分别为 23871 元和 27745.5 元。

书业诚古籍字画店是渠仁甫在 1923 年接收清代早期设立的、山西历史上最大的私人书

坊——“书业德”而成立的，总号设在太原靴巷30号（2003年太原市政府定为太原市文化遗存），祁县设分号，主要出版、刊印古籍，经营古籍善本与名人字画，附带文具、纸张，是太原有名的老字号。新中国成立后则以经营文具纸张为主，当时资本合人民币6千万元（旧币）。1956年按当时的政策公私合营，并入太原新华书店，折合股金8024.87元。

是盛楼点心店是祁县有名的老字号，位于城内最繁华的东街十字路口，民国年间由渠仁甫与其堂弟渠晋云接办。是盛楼所产糕点、月饼以选料精、加工细深受客户欢迎，祁县民谚有“要吃好的是盛楼”。其产品远销包头、绥远、北平、天津等地。祁县各大商号，每年都要在是盛楼订大量月饼，中秋节分送各地分号，供伙友与“相与”享用。是盛楼所产月饼品种有：提浆、提豆、提枣、混糖、混豆、混枣、翻毛、蜜酥、水仙酥、玉仙酥、冰糖酥、雪莲酥、至酥、金饼、自来红、自来白、茯苓饼、玲珑饼、干并皮儿、郭杜林等。有的品种只约定加工，不上市，如雪莲酥只供本县乔家堡“在中堂”一家。1919-1937年，是盛楼每年特制两个百斤重的特大月饼，一个赠送给渠仁甫创办的竞新学校，供全校师生食用，一个供本店店伙分享。这是祁县历史上最重的月饼。是盛楼的另一知名品牌是鲜绿豆糕，每年夏历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九日各做一次。取精选绿豆蒸熟去皮，碾成泥，加入两倍的白砂糖，过筛入模，敷细白糖作面，切成块后再加“寿”字印；如夹馅则分两次入模，中间夹豆沙、玫瑰膏、山楂泥等。当日现做，午后供应，只售一天，货完为止。这种绿豆糕清凉香甜，酥香可口，兼有去暑败毒、清心明目之食疗作用，深受祁县民众喜爱。1942年后停制。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经营，当时资本为人民币两千万元（旧币）。1956年按当时政策公私合营，改为祁县杂货店食品第一门市部，折合股金2127元。

渠仁甫一生大部时间都生活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正值列强入侵、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日寇占领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等等，是个不济之世，战乱不断，动荡不安，时局不稳。在这样极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条件下，他在不同时期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策略。

辛亥革命中，有的票号被抢，有的贷款收不回来，再加之票号竞争不过现代银行，导致山西票号都相继倒闭。其祖父亲手经营的“长盛川”票号也于1909年关闭，合伙经营的“百川通”票号在他接管家业一年后也关闭。在这一晋商生死存亡大转折时期，大多晋商从此一蹶不振。但他没有悲观气馁，而是努力寻求商机另辟蹊径。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20年间，他采取的是迎难而上的策略。这一时期虽有战争，但均是短时的、局部的，他抓住这一时机，在夹缝中寻求发展，除继续经营和扩大长裕川茶庄的业务外，又先后开办了湖南诚记茶号、晋裕诚布庄、书业诚古籍字画店、集庆和夏布庄、是盛楼点心店，并以巨资从